

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上海資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中国科学院上海經濟研究所
上海社会科学院經濟研究所 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上海

• 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 •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編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 公厘 1/32 印张 24 5/8 插页: 13 字数 604,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統一書号: 4074·196

定 价: (精)3.80元

封面設計: 任 意

插图目录

- 簡照南致簡玉阶的亲笔函
- 上海厂原有的三个工場
- 將落成的第四工場
- 香港厂的外观
- 汉口厂厂房外观
- 許昌收烟厂的外观
- 产品銷售趋势图
- 上海厂正門內的檢查崗
- 卷烟部機車修理車間狀況
- 厂方僱用的警卫
- 杂工放工时的情况
- 在放工中的女工和童工
- 包烟女工劳动狀況
- 拍叶部女工劳动狀況
- 宋子文攫取公司外汇的亲签收据(一)
- 宋子文攫取公司外汇的亲签收据(二)

序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以下简称南洋)是我们对上海资本主义企业进行調查研究的典型企业之一。我們把它当作麻雀来解剖,因为:它是民族华侨資本、規模較大、历史悠久,在輕工业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由于它经历过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它的历史不仅反映了它本身的发展过程,也一定程度地反映出所有民族資本企业半世紀以来在不同的政治經濟条件下的遭遇,这部史料正有力地說明了这一个事实。

(一)

由于我国过去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民族資本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因而它的发生发展过程是相当曲折的,我們从南洋这个民族資本企业身上,就能具体地揭示出来。它经历了惨淡經營、由小到大、由亏到盈、由盛轉衰,經常在动盪不定的岁月中度过的曲折过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才走上正常发展与为国民經济服务的道路。

南洋于1905年在香港創立,创办人簡照南是日本华侨,資本为港币10万元。由于缺乏技术与經驗,并受到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与打击,于1908年,即以資本亏蝕殆尽而歇业。以后得到他的叔父越南华侨簡銘石的支援,以港币9万元于1909年重新复业,直到1911年,始由亏损轉向盈余。由于国内市場扩展和第一次大战帝国主义暂时放弃我国市場等原因,南洋营业不断增长。1916

年在上海設廠，接着分支機構遍設全國各大城市及南洋群島一帶。這一時期每年都有盈利，自1916年到1919年每年盈利都達100萬元以上。1918年企業改組為有限公司，向“北洋政府”註冊，額定資本為500萬元，實收270萬元。把企業的中心由香港移至上海。在這一時期，南洋的最大競爭者英美烟草公司曾三次企圖吞併它。由於條件沒有談妥，未曾實現。他們為了戰勝這個兇惡的對手，也曾在“北洋政府”企圖“官商合辦”與“捲烟專賣”的情況下，爭取合辦，以便取得依附，也沒有成功。但是客觀形勢逼着他們必須進一步擴大企業和增加資金，一方面，企業的迅速發展和大量盈餘充分吸引着他們，另一方面，又感到當時實力還不足與英美烟公司抗衡。由於以上原因，終於1919年又一次改組，向社會招股，擴大資本額為1,500萬元港幣。簡氏家族仍以最大的股東地位控制了企業。改組後發展很快，機器設備的價值1921年比1920年增加了116.6%，1922年比1921年又增加了35.7%。這一時期獲利仍很豐，1920年盈利率32.39%，1921年為29.97%，1922年為27.23%。惟好景不常，帝國主義已經卷土重來，南洋的盈利也開始下降，但每年仍能維持一定的水平。從1927年起，南洋營業開始下落，一方面由於與中外捲烟業的競爭加劇，稅捐逐年加重，另一方面南洋內部管理因逐年發展並盈餘，已有躊躇滿志逐步走向腐敗的趨勢。特別是由於國民黨統治堅決執行投靠帝國主義的政策，不但不保護民族資本，反而在稅收政策上，加重民族資本企業的稅收，使中外企業在稅捐負擔方面不平等，南洋與英美烟草公司在市場競爭上居于不利的地位，使南洋從歷年盈餘的局面逐步走上虧損，1928—1930年3年間即虧損了575萬元。在此情況下，資本家唯一挽救自己的出路是把一切虧損的負擔殘酷地加在工人身上，實行停工關廠，解散工人。同時於1931年把資本額從港幣1,500萬元減資為通用銀元1,125萬元。但是，這些措施並沒有能夠挽救民族資本的厄運。到了1937年接近抗戰前夕，由於企業管

理腐敗与簡氏家族内部矛盾的扩大,企业已临于奄奄一息的境地,資本家对于維持南洋失去信心,宋子文官僚資本集团便乘虛而入。簡氏家族以半推半就的姿态迎接了宋子文集团的合作,实际是宋子文集团取得了全企业的半数股权与絕對控制权,簡氏家族的代表簡玉阶則退居于公司的閒散地位。官僚資本侵入南洋不到4个月,抗战爆发,“八一三”事变时,上海总厂被日寇所燬,随着战争形势轉移,公司业务中心則逐步轉移到香港、重庆,并建設了重庆厂。南洋一直为官僚資本集团所控制。

从1937年直到全国解放止,大約12年的時間内,南洋基本上和所有官僚資本企业一样,已經很少民族資本的气味。在官僚資本集团的控制下,进行投机倒把、套購外汇、囤积原料、搜括資財,甚至在抗战胜利以后,借宋子文集团的政治力量,接夺机器设备,与英美烟草公司在分配原料与銷售上进行分贓合作。直至解放以后,才使这个民族資本企业恢复了生命。1949年6月实行軍事监管,1951年2月实行公私合营,經過清估财产,核定資本为848万元。

南洋的53年历史告訴了我们什么呢?

首先应当肯定:民族資本家把商业資本轉为工业資本,除了是由于一种追求利潤的冲动外,比起商业資本家来,他們是具有更大企业心的。虽然,他們經營工业的終极目的是为了利潤,不是为了人民的需要,他們同样殘酷地剝削工人,但在帝国主义經濟侵略中国的情况下,无论如何,它促进了我国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它的积极性的一面的。同时他們总还是在帝国主义敌人的口袋里,夺回了一部分財富,除供資本家的享受揮霍外,也保存了一部分財富下来,最后成为人民的财产。

其次,我們也应当肯定,民族資本工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它的发生和发展絕不是孤立的,必然要受历史条件的制約,要与民族共命运;它的盛衰变化,常常是和历史的政治經濟情况的

变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們看：

第一，1905年当簡氏在香港创办南洋时，正是清朝末叶，国内高唱“创办洋务”与“实业救国”的时候，也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深入中国市场，严重地破坏了我国自然经济的时候，洋烟逐步在代替土烟，帝国主义经济正是为洋烟开拓了市场。这时候英美烟公司已经在港创办，北洋烟厂的“龙球”牌，日本的“云龙”牌，香港的“朱广蘭”牌，生意也日渐兴隆，这就是刺激簡氏兄弟决心把商业资本轉投入工业的主要动力，南洋烟草公司也就应运而生。

第二，南洋既然叫做民族资本企业，因而它的盛衰变化，往往随着人民爱国运动的发展而变化。我們知道南洋企业开始盈余是1911年，从1913年到1919年，7年左右时间，它就从1909年改組时的资产9万元、負債13万元的基础上积累了资本600多万元。这是南洋的黄金时代。我們知道，这时候国际国内形势，正是有利于民族资本企业发展的时期。（一）我国辛亥革命以后，人民爱国力量开始增长，对于这个新兴的民族资本工业的国货产品表示了欢迎态度。（二）帝国主义忙于大战，暂时放松了对我国民族资本的压迫。（三）更重要的是由于第一次大战的結束爆发了十月革命，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推动了我民族的觉醒。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日益高涨，对于民族资本企业是极大的支持力量。而南洋企业正是以“国货”为号召，扩大宣传，获得了广大人民的爱好与支持。这时南洋的各方面条件都比英美烟公司为差，而在南洋与它的竞争中竟居于不败之地，正是由于这个最重要的支柱。当英美烟公司多次以利誘威胁企图吞併南洋的时候，南洋的资本家不敢同意，不是别的，也正是由于怕因此失去了这唯一有力的支柱——民族的力量。南洋另一个资本家簡玉阶在考虑合併問題时曾肯定“我营业之增进，多借国货二字为号召，故得社会人心之助力，致有今日。……若一旦屈降外人，縱不为社会所唾骂，亦会使提倡国货者灰

心。而我公司营业，必从此失败矣”。这个教训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更突出地表现出来。轰轰烈烈的全国反帝运动与群众抵货运动，带给南洋的是南洋产品在全国范围内供不应求，盈利有显著的提高。很显然的，南洋自1911年由亏损转为盈余，随着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它的发展没有停滞，尽管企业本身在经营管理上已经暴露出严重的缺陷，但这种发展与盈余的局面是一直维持到大革命失败以前，这就证明了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与繁荣，和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是那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四)当1927年民族资产阶级跟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向敌人投降叛变了革命以后，民主革命运动走向低潮，它们的企业也就开始走下坡路，南洋就是其中的一个。当然尚有其他因素存在，但民主运动的高涨，广大人民对民族资本企业的支持应是促进民族资本企业发展的主流。而且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动统治，带给民族资本企业的是苛捐杂税与摧残。以1936年公司的总收入的分配为例，捐税占了38.7%，推销费用占7.9%，推销费用高，说明了市场竞争的剧烈，而市场竞争是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保护帝国主义企业压抑民族资本的不平等税收政策的自然结果。

第三，民族资产阶级跟随着反动统治阶级离开人民，促使企业衰退，不从政治上和企业管理上找寻企业衰退的根本原因，力求挽救的道路，反而勾结反动统治阶级利用黄色工会更加疯狂地残酷压迫与剥削工人，公开抛弃了民族资本所借以宣传的“实业救国”、“挽回利权”的招牌，日益失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其结果自然是每况愈下，日益走上与官僚资本合流的道路，这就是南洋1937年在不太勉强的情况下被宋子文官僚资本集团侵入与控制的必然下场。

(二)

民族资本家和所有资产阶级一样，他们经营企业的目的，是为

了追求高额利润,越多越好,而利润的获得是依靠残酷地剥削工人来实现的。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因而中国民族资本家为了迅速完成资本的积累以及应付双重压迫所带来的高额税捐的担负与严重的市场竞争,以及战争和不稳定的政治经济局势所造成的损失,必然更加残酷地剥削工人以求得一定的补偿。有的人企图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美化为“红色资产阶级”,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毛主席早在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毛主席这一分析在南洋史料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我们从几个方面看看南洋这个民族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的:

第一,从完成资本积累的过程来看,南洋1909年第二次改组时额定资本仅为13万元且已亏损了4万元,实际资本只有9万元,从1911年已由亏转盈,每年逐步增加,1915年为32万元,1916年为115万元,直至1919年,每年都在100万元以上。在短短7、8年间,滬港两地已积累了资本600万元以上。这不是南洋工人对这个企业的最大贡献吗?而资本家给予工人的待遇,实在是少得可怜的,以1916年为例,香港厂的57.4%的职员与长工的工资每月是在12.5—17.5港元之间。而1,000多名计件女工的工资大体只比每日1角5分多一些。工人工作时间一般在11小时以上,同时在管理方面还执行了严格的懲罰制度,如罰銀、辞退、开除等等。大量的使用童工,遇有产品供不应求的时候,尽可能不增加固定工人,经常采取加班加点办法从3小时至通宵。其剥削的残酷程度可见一斑。整个说来,工人工资在企业的总收入中占的比重是极微的,如以1936年为例,工人工资仅占3.8%,1933—1936年4年平均为4%左右,而同期间的剥削率根据估算数字当

在1,000%以上,这还都是盈利較低的年份。

第二,資本家对于工人殘酷的剝削,是从来沒有止境的,只要企业的营业受到任何損失,都要采取各种手段从工人身上求得补偿,南洋資本家也沒有例外。1924年上海厂由于盲目发展与經營管理上的原因,亏损了70万元,但整个企业还是盈余的,資本家竟通过职员和工人中的敗类,把1922年11月工人經過斗争取得的17条加以廢止,重訂不利于工人的新約。工人們在經過20多天罢工和几个月的斗争,結果在資方的高压下失敗了,好几百工人被开除。在企业营业不振和亏损时,更是不擇手段地加强剝削与压迫工人,最惡毒的办法就是不顧工人的生活与失业采取停工关厂的办法。它这样做,既可以利用暂时停止生产,以减少产品积压与亏损,又可以在复工时以較低的工資招收新工人,强迫老工人接受新工人待遇,并可借此把工人中的进步分子加以淘汰,而工人們就只好遭受失业和飢餓的痛苦,1927年1月的香港厂停工,1929年1月的上海浦东厂的关厂,与1930年1月的上海总厂停工等,其目的就在这里。对这些停工关厂,工人們都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資本家为了鎮压工人竟不惜勾結和收买反动的国民党党部、社会局和利用黄色工会对工人进行压制与分化,甚至以武裝軍警加以鎮压,造成流血慘剧。資本家在停厂和鎮压了工人之后,为了进一步剝削工人,竟把生产以最低代价包給車間管理人員,通过他們来加强对工人的剝削,資本家对此曾揚揚得意地說:“此种成績,大約可得到今后成本比前輕得多,出貨快得多,工作緊張得多,用人少得多”。这就是他們的自供。

第三,南洋資本家在对付工人方面,已經从資本主义国家学到了一套統治工人的法宝。他們知道工人階級的团結是反对資本家殘酷剝削与压迫的有力武器,而堡壘又只有从内部最易攻破,所以他們裝着同情工人团結的样子,但始終企图通过自己的走狗把持与操縱着工会。他們更收买利用工人中的敗类,利用流氓特务打入

工会,利用广东籍工人与非广东籍工人、职员与工人之间的矛盾等,从内部破坏工人的团结。南洋的黄色工会曾经使南洋工人在与资本家的斗争中,遭受着一定的困难,它起了腐蚀工人造成工人阶级分裂的作用。南洋工人在我党的领导下曾经与黄色工会作了不懈的斗争,保证工人大多数的团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的资本家由于对工人的剥削与压迫十分残酷、十分露骨,因而黄色工会的真正面目很容易暴露出来。这也是南洋资本家在压迫工人的过程中,仍不得不有时要亲自出马与利用反动政权的道理。

第四,南洋资本家不但对工人的剥削与压迫是极其残酷的,由于卷烟工业的原料,主要取给于农民,因此它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也是严重的。他们在河南许昌、山东坊子等烟叶产地与当地封建势力勾结,大量购地开办收烟场,直接向农民收购烟叶,利用预购、高利贷等方式剥削农民。在收购过程中还通过“进门费”、“老户票”、“压磅”、“压低等级”等种种方式进行剥削。仅许昌收烟厂的“余磅”一项,在1920—1931年间,平均占到收购量的12.3%,最高时达16.3%,也就是公司收购烟叶100磅,而农民实际要交116磅多。剥削之重于此可见一斑。

从上列各点可以看到:我国民族资本企业也是依靠残酷剥削工人和农民的血汗以滋养自己,才能繁荣生长起来的。今天民族资产阶级在党的赎买政策下将企业实行公私合营,自以为对国家有贡献,应当从南洋史料中认识到:这些民族资本企业难道不都是无数工人与农民血汗的结晶吗?没有工人、农民的辛勤劳动,忍饥挨冻与流离失所,那里有这些资金的积累与资产阶级的优裕生活?今天将资本主义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正是物归故主,民族资本家又有什么值得骄傲呢?

(三)

毛主席在1939年12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

出：“民族資產階級是帶兩重性的階級。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又受封建主義的束縛，所以，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矛盾。從這一方面說來，他們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國革命史上，他們也曾經表現過一定的反帝國主義和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積極性。但是又一方面，由於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軟弱性，由於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並未完全斷絕經濟上的聯繫，所以，他們又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這種情形，特別是在民眾革命力量強大起來的時候，表現得最為明顯。”這段話是對我國民族資產階級最深刻的分析，從南洋史料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說明。南洋資本家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關係，反映在企業的經營上面，就深刻地暴露出它的兩面性。因為三大敵人給予了民族資本的壓迫，如：帝國主義利用不平等條約的優越條件和在市場原料等方面壓迫民族資本，封建官僚統治造成的沉重的捐稅和混亂的政治經濟局面，也嚴重地危害到它的生存與發展，因而民族資產階級和三大敵人存在着尖銳的矛盾；它為了企業的利益求得生存與發展，它必須和它們鬥爭。但是，帝國主義挾有雄厚的資本力量、技術力量和政治力量，封建官僚統治又是直接的統治者，它在資金、技術與壓迫工人以及取得市場競爭、原料收購的有利條件方面，又對它們存有依賴性，因而必須和它們妥協，甚至要投靠它們。這種鬥爭與妥協常隨着具體的矛盾發展而變化。

首先，我們應當肯定，它和帝國主義企業——英美煙公司，在市場競爭與併吞企圖的鬥爭，從1905年成立之日起，到1936年被官僚資本控制之日止，一直持續了32年之久。鬥爭是複雜的，長期的，尖銳的。由於資本家體會到這個企業是依靠民族特點和以國貨為號召，才能迅速積累了資本，並在不利的條件下，取得了鬥爭的一定勝利，因而在英美煙公司三次的利誘威脅的談判中沒有和英美煙公司妥協，也就是說沒有向敵人屈膝，這是好的。但是也應當指出：它們在和英美煙公司的鬥爭中常是動搖的，他們認為：“不

合併則已，如合併則合‘空山’（英美烟公司）有百利而无一害。……何則？‘空山’勢力之大，若与为敌，則我日日要左顧右盼，无异与惡虎爭斗，倘一疏忽，即為吞噬；若与合併，則变为通家，如孩童之得有保姆保护，时时可处于安乐地位……”。这完全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对帝国主义企业的畏惧和依賴心理。而且它在許多方面和帝国主义更有千絲万縷的經濟联系。如（一）資本家簡照南与日本的关系。他在創辦南洋前，曾挂日本旗，經營广东九輪船业务；1902年且加入日籍，1919年才恢复国籍；創辦香港厂，聘日本技师，購日本机器原料；在受英美烟公司的压迫时，还利用过日本人出面办交涉等等。（二）在一段很長时期內，企业的流动資金的調度，主要依靠帝国主义企业和买办，如曾依靠祥茂洋行的买办陈炳謙在近10年的一段時間內經常調度資金在200万左右，以后又直接依賴汇丰銀行，最多时曾达280万元。（三）与美商合办一个“中美烟叶公司”，專門供应南洋所需要的美叶。（四）在南洋領導機構的董監事当中，有很多外商銀行洋行的买办，如著名的主持广东商团反革命叛变事件的反动头子英商买办陈廉伯就曾長期地控制过南洋港公司的領導权。我們从上述可以看出南洋与帝国主义企业的关系：妥协与依賴是多方面的，只有与英美烟公司的市場斗争才是坚决的。

其次，南洋与代表封建主义的北洋軍閥政府，也曾为了合办与爭取卷烟專卖权，进行了多次談判，为了拉攏“北洋政府”，还把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拉进了公司的領導機構。当“北洋政府”提出与南洋合办烟厂意見时，資本家一方面考虑到“商人与官厅合作事业，原多可慮之点”，但另一方面又認為（1）“可拒絕外人承办；（2）可得政府在全国提倡自己出品；（3）与政府合营生意信用自是不同”等等，而“拟出以九牛二虎之力促其实现”。从此不难看出民族資產階級对于当时北洋軍閥仍然存在着依附的打算的。虽然它对于“北洋政府”的稅捐政策是不滿的，特别是对于1921年

和1925年“北洋政府”与英美烟公司所訂的、显然在稅捐上媚外的所謂“声明書”，曾經联合同业通过上海总商会和全国商业联合會作了一定的斗争。总之，民族資產階級对“北洋政府”的依賴和妥協或者是斗争，都是从本身的利益为出发点的。

第三，南洋資本家对国民党反动統治的关系是比較突出的。从很多方面看起来，他們不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对国民党反动統治存在着幻想，特别是与国民党的广东派官僚資本集团有密切的关系。如陈公博任国民党“实业部長”时，两次出面招股，南洋慷慨認股，一次就是10万元；1929年間，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等都曾利用南洋的經濟力量进行政治活动；而在镇压工人运动方面，又經常与国民党党部、社会局、报館和軍警机关密切合作。这都說明了南洋資本家与国民党反动統治的关系。1933年在南洋营业不振的情况下，国民党反动統治曾打算收購南洋国内資產，設立“国营烟厂”，南洋資本家認為收購办法使“血本有着；公諸国家，两得其当”，表示愿与“政府”合作。1937年南洋整个墮入宋子文官僚資本集团的掌握，也不是偶然的，这与南洋資本家长期以来与这个官僚集团的联系，不能没有关系。当这个企业由于簡氏家族內部的分崩离析，与經營管理的腐敗和外部市場竞争的失敗等原因，日漸趋于沒落的时候，就把幻想寄在宋子文官僚資本集团方面，希望依靠他們的“势力和关系，可能改善南洋內部的經營管理，使南洋业务复兴，并可能加强南洋对外竞争的力量”等等。事实上南洋正是依靠了这一集团的力量和影响，度过了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不过要指出，南洋資本家并没有从此得到什么好处，最后幻想是破灭了。

从上分析，不难看出，南洋資本家与所有民族資產階級一样具有显明的两面性。他們和工人階級的矛盾是絕对的，除了特殊历史时期暂时有所緩和而外，斗争一般是不可調和的；而与三大敌人的关系，基本上是依賴的、妥協的，只有在严重影响到企业和資本

家的切身利益时,才进行一些必要的斗争,这就是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所指出的:“……,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四)

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上述各种特点,这些特点必然要反映到并决定着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南洋正是代表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民族资本企业的典型。它具有一般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上的某些优点,但又不可避免地保存着封建主义性质和买办性质的若干内容和缺点。

首先,从组织形式上来说,它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但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又是以简氏家族的股份,特别是简氏兄弟的股份为中心的,甚至以法定手续明确规定简照南为公司的“永远总理”,并保留简氏家族的继承权。

其次,这个企业具有一个卷烟业完整的规模,它掌握了供、产、销整个过程的各个环节,如它在国内及南洋群岛的中心地带有自己的工厂,为了解决原材料,有自己的收烟厂(烤烟),印刷厂,制罐厂和造纸厂等等,销售网更是分布得星罗棋布,全国各地,几乎都有他们销售和代售单位。

第三,这个企业在经营上充分掌握了卷烟工业的特点。由于卷烟这一产品,既是消耗品又是广大人民所必需的,所以他们非常注意推销政策,经常调查研究消费者的心理变化,注意商标与广告宣传,在南洋整个开支中,销售费用占了较大的比重,如以1936年为例,推销费用占了总收入的7.9%。同时也反映了与英美烟公司市场竞争的激烈。他们为了推销产品,常常采取“办公益”、水灾救济和捐资兴学、保送留学生等办法,扩大南洋在社会上的影响,以争取市场。这些做法是深得资本主义国家自由竞争的奥妙的。

第四，南洋在創辦之始，曾強調培養幹部，延攬管理人材。南洋確實在捲烟業方面培養了一些人材；但在人事安排上非常強調封建家族關係，重要的職位，首先是安排自己的家族和親屬中的人，其次是廣東同鄉，連選派學生、培養幹部都常以廣東人為主。

第五，這個企業與很多其他民族資本企業相同，在經營本行業務以外還經營非本行的業務，帶有一定的投機性質，如他們曾從事地產買賣，以及其他商業活動。

最後，這個企業在有了基礎以後，整個經營管理工作逐步腐敗起來，貪污舞弊的現象是極其嚴重的，特別是簡氏家族和一些公司的當權派，用公司的款項從事投資，盈餘了算是自己的，虧倒了則歸諸公司。有的且專門開設了附屬企業，供應公司用品以謀取暴利。如總公司負責人之一簡英甫，港公司的主要負責人陳廉伯，都曾被揭出大規模舞弊事件。由於中國民族資本企業，既是資本主義的，而又是帶有嚴重的封建買辦性質，因而也反映到企業的經營管理方面來。

(五)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結束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民族資本企業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南洋同所有民族資本企業一樣，在黨對民族資本企業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下，發揮了它的作用。特別是南洋，由於後期受官僚資本主義控制了12年之久，更迫切需要加以社會主義改造。在解放前夕，事實上南洋已成為官僚資本的私人資產，投機倒把，偷逃資金，生產不能維持，工人生活困苦，民族資本家被排擠在企业門外。一直到解放後，實行了軍事監管，南洋才得到了新生。南洋於1951年實行公私合營後，通過各種改革，完全改變了面目。由於企業性質的改變，工人階級成為企業的主人，發揮了職工的積極性，生產大大發展了，1950年—1956年間產量提高了2.6倍，盈